



全球化译丛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东亚的复兴

以500年、150年和
50年为视角

〔美〕乔万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日〕滨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 主编

〔美〕马克·塞尔德 (Mark Selde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球化译丛

东亚的复兴 以500年、150年和

The Resurgence of 50年为视角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美〕乔万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日〕滨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 主编

〔美〕马克·塞尔德 (Mark Selden)

马援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美)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塞尔登主编;马援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全球化译丛)

ISBN 7-80230-030-4

I. 东... II. ①阿... ②滨... ③塞... ④马...

III. 经济史-研究-世界 IV. 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708 号

·全球化译丛·

东亚的复兴

——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

主 编 / [美]乔万尼·阿里吉 [日]滨下武志 [美]马克·塞尔登
译 者 / 马 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 静 高明秀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4.25
字 数 / 338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230-030-4/K·23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4-5625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3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球化主题书系总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来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

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90 年代以后达到了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简直成了生活中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之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陆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及对策等做出系统的研究，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全

全球化理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ranational theory）。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从全球化研究的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国别的研究领域。在 21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它将一直是各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谢寿光社长及其领导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推演主

题出版新理论，雄心勃勃，力图成为发表国内外全球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主要出版社，成为展示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重要平台，在近些年集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和译著，其中包括《全球化译丛》、《全球化论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并协办、联合主办了一系列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年，北京）、“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年，河北）、“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年，武汉）等，先后邀请了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大卫·赫尔德等数十位全球化问题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讲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作为这一全球化主题系列书系的一个编者，我衷心地希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能够在广大读者、作者和译者朋友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地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使书系越出越好。

俞可平

2003年6月9日

目 录

导言：从地区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东亚的复兴 …… (1)

第一章 朝贡和条约

——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

条约口岸网络，1800~1900 …… (20)

第二章 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 …… (61)

第三章 东亚经济发展之路

——一个长期视角 …… (96)

第四章 欧洲和东亚妇女的工作、家庭与

经济发展

——长期进程及当代比较 …… (153)

第五章 帝国晚期经济结构中商业的	
重要性	(217)
第六章 日本，技术与亚洲地区主义的	
比较分析	(271)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历史：东方和西方	
.....	(332)
中英文人名对照	(427)

导言：从地区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来 理解东亚的复兴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
马克·塞尔登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发生了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作为世界两大军事霸主之一的解体，以及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力量中心之一的崛起。就这两个事件而言，苏联解体的意义显而易见，它也的确最引人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么一场政治结局的戏剧性特征，而且在于它恰恰迎合了人们对于帝国兴衰规律的一些普遍认识。相对来说，人们对于东亚崛起事件的认识仍存在争议。它不仅与苏联解体的意义难以相提并论，甚至同相继出现的美国经济复苏、日本持续的经济衰退以及 1997 年东亚经济危机等事件相比，也不见得重要到哪里。而且与苏联解体事件不同的是，东亚的崛起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确切时间点，这一点不太适用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

正如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看到的，就某些方面而言，东亚崛起的步伐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确显得有些停滞下来，特别是对日本来说。然而，与这种停滞相伴随的是在东亚其他地

区毋庸置疑的扩张趋势，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这种趋势甚至可能改变地区和全球的发展进程。从一个完整的地域和时间概念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又一次经济中心的转移。像这种规模的中心转移，不发生一些停滞和短暂的衰退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尽管在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即从西欧转到了北美，但20世纪30年代仍发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大萧条（阿里吉和西尔弗等，1999：95～96，274～275）。但是，停滞和衰退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这个根本趋势的认识。

本书的目的是在一个更广、更长的动态区间内，探索这次转移的起源，在有关该主题的大量文献中，这种分析角度却涉及甚少。我们的基本假定是：东亚地区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独特的经济变迁，应该归结为世界性—地区性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应看作仅仅是单一国家层面的封闭式发展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同意布鲁斯·卡明斯（1987：46）的结论：将国家与国家进行对比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误导，因为它“错误地割裂了那些在本世纪产生重要作用的区域性力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通过研究日本和它的前殖民地韩国、台湾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卡明斯发现，“只有通过隐藏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本地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系统性交往关系，才能理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1987：47）。我们和卡明斯的研究一样，将存在于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以及本地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这种交往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但是，我们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更进了一步。通过把现时的发展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分析，以及将东亚地区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中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东亚的变迁过程获得更好的解释。

东亚变迁过程的三个时段

吉尔伯特·罗兹曼这样写道：

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就非常了不起，直到十六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东亚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它经历了一个相对短暂但刻骨铭心的衰落过程。然而，现在只要看看该地区的诸多国家以及那些举家移居海外的东亚人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同意，东亚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1991:6)

正如引文所指出的，在东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存在三个明显的时间架构或时间段。首先是一个“短暂期”，其标志是该地区内的国家、地区以及东亚整体上所代表的成功模式。对这些模式进行分析的相应时间段是50年，其间发生了日本在二战的失败、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整个地区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所导致的殖民帝国的解体、东亚以及世界分裂成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对立集团，最后由于经济交流及政治和战略上的转移，在抚平了深刻的裂痕之后，一种新的地区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事件彻底重塑了该地区内部及外部的相互关系，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就这些事件本身以及这种重塑的方式而言，只有从第二个时间段的趋势和事件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第二个时间段是一个“漫长的”世纪，它指的由于中国的清王朝及日本的德川幕府体制的衰败、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华帝国的解体，东亚大部分地区被殖民地化，

从而导致 19 世纪中叶该地区在地位及权力方面“相对短暂但刻骨铭心的衰落”阶段。在这个“漫长”世纪中，对该地区最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起因于东亚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相对落后，西方列强在本地区周边建立的具有优势的殖民政权，以及东亚的两个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实力迅速衰落，之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日本 1868 年的明治维新、日本的工业化以及它对东亚富裕地区的征服，中国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经过 1911～1949 年及之后的不断的革命运动等。日本在 20 世纪上半叶屡次发动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力图取代中国而成为地区霸主，以自己为中心重组该地区，并试图将西方殖民势力驱逐出去。然而，只有再一次地追溯到一个更长时间段内，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对东亚具有重大影响事件的来龙去脉。

通过一个更长一些的时间段，可以使我们把东亚地区现在的崛起与罗兹曼在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该地区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联系起来。大量的文献把关注点放在诸如融合（incorporation）、殖民主义、现代化及“对西方的反应”等问题上，这或多或少地意味着要把东亚与其早期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将东亚的变迁看作是一系列交互伴生（hybridization and cross-fertilization）的阶段。自 16～18 世纪，西方经济和军事因素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参与其中，在东亚的整个帝国主义和革命时代及以后的时期中不断发挥着新的作用。在这一系列进程中，东亚历史遗产中所蕴含的东西将对地区内部以及该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交往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简言之，我们通过三个明确的时间层次，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分析，有点像俄罗斯的“套娃”玩具，一层套一层。最长的分析时段被界定在 16～18 世纪时期，当时东亚不论在官方产出还是国民的经济产出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

此同时，欧洲与东亚地区的交流融合关系日益加强。中时段分析始于东亚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在财富和实力方面开始衰落。我们无疑也注意到了在这个时段的后期东亚实力有所恢复的迹象，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帝国的形成，也包括中国和其他地方终获成功的革命运动。最后也是最短的分析时段被界定在冷战期及冷战结束之后，该地区获得重建并实现了经济复兴。总而言之，本书认为，每个分析时段都存在一些有价值的因素，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东亚的复兴和国际体系大有裨益，同时这种综合分析也将对该地区及全球未来的发展进程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作为一个世界区域的东亚

我们把东亚的历史遗产看作是独特的和动态的，这是我们整个分析的基础。在我们把东亚作为一个世界区域（a world region）的分析，以及在该地区变迁史的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分析中，都要以此为基础。然而，对一个地区的历史遗产的认知又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

对遗产（heritage）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存在很多困难——从一个地区的角度比从国家的角度进行解释更显困难，它可能使得该概念包罗万象，流于空洞。任何论点都要经得起“遗产”问题研究者在多角度、多学科、多国家和多时期方面提出的考验。

（罗兹曼，1991：22）

罗兹曼试图通过有 2500 年传承史的儒家文化来避开这些问题。然而，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东亚发展中一些共同的和显而易

见的特征，但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许多地区的自身发展轨迹而言，这种传统却没有多大关联性（这些地区包括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和菲律宾，到蒙古和中国的西藏和东北等亚洲内陆广大地区）。即使在儒家文化产生影响的社会中，其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时，儒家文化对于该地区今天的发展还能产生多少作用，也很难说清楚。不仅如此，对儒家传统的过分关注还会混淆地区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交往的体系特征，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地理方面的因素，比如海洋、陆地、河流和山脉，也有政治和经济的交互影响，再加上不同的农耕和游牧文化，以及海洋性和大陆性地区特征，等等。长期以来，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东亚成为一个具有明显多样性特征的世界区域。

像另一本东亚研究的著作所提出的那样（卡赞斯坦和施莱希，1997），本书作者也倾向于认同卡尔·多伊奇对于“世界区域”的概括：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领域中都存在显著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皮特·卡赞斯坦指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能够把握动态变迁的方法，既揭示了本体论者所关注的内部结构特点，同时又避免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外形不断变化但内核却固定如一的流动着的集合体”（1997：11~12）。“世界区域”这一概念甚至比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概念含义更丰富。他用连字符的这种表达方式是为了强调该概念“只是关注于世界的一个小的分支，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区域，它能够提供大部分自己所需的东西，其内部联系和交换保证了其系统的完整性”（布罗代尔，1984：22）。

我们之所以把东亚称做一个“世界区域”而不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研究对象空间范围的模糊而造成混乱，另一方面也想把布罗代尔定义中的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降低一些。我们使用“世界”这一名词，指的是一个包含了多种相互关联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实体。采用“区域”这一名词，就是为了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指的是“地球的某个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对“经济体”一词并不那么看重，因为一个独立和具备系统完整性的实体并不仅仅依赖其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

事实上，在对东亚地区的范围进行界定时，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正像我们在对跨区经济的分析中也要关注这种关系一样。尤为特殊的是，早在欧洲的行政和贸易组织在该地区开始扮演起重要角色之前，东亚地区的边界——包括东北亚、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就已经被当地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所确定下来。国际体系的思想最早被用来描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欧洲体系。沃勒斯坦（1974a；1974b）把这一国际体系当作他的“现代世界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包含该体系各个独立的行政单元的劳动分工体系。日本学者近来特别强调，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运行结构和方式上的重新建构，突出表明东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既有别于欧洲体系，又存在一定的可比性（见池田，1996，他对朝贡制度有一个概述；也可参见滨下武志在本书第 1 章的论述）。濮德培（1996，以及本书第 2 章）认为，正像这次重新建构过程所显示出的那样，至少在 19 世纪以前，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主要是面向中亚而不是东南亚（菲茨帕特里克，1992）。但是，这种两面性的解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亚和欧洲两个国际体系之间的可比性。

东亚国际体系的存在明显使得对东亚作为世界区域的空间边界的划分不再复杂，也使我们在相应时段内对该地区变迁过程的把握变得不再困难。但对“世界区域”的疑问总是存在的。

这些疑问主要归因于对“区域”(region)一词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我们的定义主要关注的是相邻的领土或地区间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最常用的一个定义。更为广泛使用的定义主要关注相邻区域在特性、文化及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同质性(哈维,2001:225;马丁·刘易斯和维根,1997,第6章)。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实际上,具有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相互交往的前提条件。例如,当今欧洲就常常被作为这种观点的很好例证。反过来,这种交往又使各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和其他方面更加强了同质性。果真如此的话,关于“区域”的两种定义就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了,任何一个定义都可视情况用于特定的区域分析。事实上,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排斥差异性的存在,并可能反而会由于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这些国家会找到不同的发展之路,正像农耕文化的中国和游牧文化的亚洲腹地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从这种意义上讲,关于区域的两种不同的定义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特定地区的实证分析要求我们必须确定哪种定义更为优先。

把东南亚界定为一个世界区域时产生的矛盾认识可以用来说明上述问题。关于东南亚的大多数研究都关注于:按照同质性标准,东南亚是否能构成一个世界区域?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因为其非本土化异质性的宗教、文学、政治和经济特点,东南亚被认为不能构成一个世界区域。这里,维克多·利伯曼“通过与欧洲甚至是与南亚的比较”,发现东南亚的类型是属于“移植的或掺杂型的”(1993:476)。马丁·刘易斯和卡尔文·维根在对此现象进行总结时写道,“无论怎么看,相异性总是要多于相似性”(1997:175)。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由于东南亚具有被欧洲和日本殖民统治的经历,以及前殖民时期历史中继承下

来的同质性，东南亚又被认做是一个世界区域——这种前殖民地遗产是一些东南亚研究者为将研究领域具体化而采用的一种研究视角。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安东尼·里德的视角：抛开各种外部影响和内部差异不论，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为该地区提供了一种明显的特质——这种特质不是其他，而是表现为对商业和金融关系的重视，这些关系保证了社会秩序和妇女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1988；1993）。

不管这些对立观点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关于世界区域的定义还是更多地采用相互依存和相互交往分析的角度，而不是同质性分析的角度。从这个论点出发，我们认为，自16世纪起，东南亚就成为东北亚和亚洲内陆经由好望角和美洲与南亚和欧洲进行区域间贸易的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枢纽。这就意味着，按照当时的标准，经过该地区的海运不论就物品数量还是种类来说都已经相当可观了——用阿奇伯德·刘易斯的话来说，与“地中海或北方地区与欧洲大西洋沿岸间的海运规模”也几乎不相上下（引自布罗代尔，1984：486～487）。但是它也同时意味着，与东南亚保持最重要依存关系的地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近（南亚和东北亚）也有远（欧洲和美洲）。因此，按照我们的定义，东南亚并不能作为一个世界区域，而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群落（social-spatial grouping）的次级区域（sub-region）。

把东南亚定位到一个更大的区域联合体中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哪个更重要些？如果认为区域间依存关系更重要，我们恐怕就得同意安德鲁·G·弗兰克（1998：14，24）所提出的“全球逻辑视角”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早至13世纪就已经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它包括了非洲和欧洲的全部（在1500年之后还把美洲也包括进来），这一体系对地区内所有成员